

河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晋察冀边区集市研究

姓名：赵立伟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李金铮；邓红

20090501

摘 要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也是新民主主义制度较早实施的地区之一，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各地集市都基本停滞。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成功开辟之后，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的政策，对边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随着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集市也逐渐恢复和繁荣起来，边区政府及各专区政府都制定了各项相关政策对原有集市进行恢复，并在适当的地点建立新的集市以满足军需民用。本文在对大量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从集市的恢复和发展、集市的管理与改造、集市的结构与交易、集市的政治宣传功能与对敌斗争功能四个方面对边区的集市进行论述。总的来说，晋察冀边区的集市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全体军民的努力下，虽处于战争环境，但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关键词 晋察冀边区 集市 庙会 集市管理委员会

Abstract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Region is the first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 which is created leded by China's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regions where carried out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system. It is consider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s "a model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and" United front of the model area " After the outbreak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na's economy suffered a serious blow, around the market are basically stagnant.After the creation of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developed a lot of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policies. These polic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conomic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Region economic, gradually around the market and restore prosperity.Government formulated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market to restore the original,and Seted up many new marke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four aspects which ar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management and reform of the market, Structure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market, and function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the fight against the enemy functions of the market discussed the market of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Region. Overall, a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the market Accessed to a larger development,suppor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Key words: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Region; Market; Temple fair;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market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赵立伟 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 ，在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保护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为申请河北大学学位所提交的题目为（晋察冀边区集市研究）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李金铮）指导并与导师合作下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河北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导师的研究经费资助下完成的。本人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河北大学的相关规定。

本人声明如下：本论文的成果归河北大学所有，未经征得指导教师和河北大学的书面同意和授权，本人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和传播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内容。如果违反本声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声明人：赵立伟 日期：2009年5月25日

作者签名：赵立伟 日期：2009年5月25日

导师签名：李金铮 日期：2009年5月25日

前 言

集市是人们进行物资交换、买卖等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集市的形成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1]P83}集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易经·系辞下》中就有“日中为市”的记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神农日中为市，至天下之农，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此立市始。集市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集市的地点和时间都基本上固定了下来，成为满足本地农民、手工业者生产、生活的必须场所，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各地集市都基本停滞。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成功开辟之后，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的政策，对边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边区境内集市也随着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发展。开展对边区集市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晋察冀边区经济的研究，同时因为集市主要作用于乡村社会，所以开展对边区集市的研究，加深对当时集市的了解，可以帮助现在农村集市的发展，给当今农村集市以借鉴。因此开展对晋察冀边区集市的研究，不仅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集市问题作为研究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集市问题的学者，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影响最深远，反响最强烈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研究中国农村市场结构、功能及其变迁的重要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施坚雅在该书中建立模型，如许檀教授所说他把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次观念引入了原本缺乏空间性、立体性的历史领域，从而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2]施坚雅选择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为典型，以乡村定期市为立足点，运用“中地理论”“巨区理论”讨论中国乡村的贸易活动和市场网格，把基层的墟市，大市集，市镇看成一个层级性的连续体，对集市的空间结构提供了系统的说明。他论证定期市在社区组织中的核心作用，是他研究中国乡村集市的主要贡献。^[3]施坚雅的理论最受中国学者诟病的要数他的六边形区域理论。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将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分为标准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集市的分布就应该符合一个等距离的坐标，好像位于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4]P21}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

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施坚雅理论的发表,尤其是在其著作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国内引起了持久的关注,其影响之大,几乎到了凡研究中国市镇、市集史者都无法回避的程度。

除了施坚雅的著作之外,还有不少研究华北农村的专著对华北地区的集市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中专门研究华北近代集市的有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书中作者“全面总结了华北乡村集市在近代的典型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具体剖析了乡村集市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规律及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5]P4}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华北农村经济的著作还有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6]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7]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8]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9]在这些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对近代华北农村的集市或商品市场进行论述。除了这些专著之外,还有很多论文对近代华北集市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龚关的《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10]乔志强、龚关的《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11]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12]和《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13]龚关的《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14]王庆成的《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15]史建云的《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16]任放的《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17]这些专著和论文从集市发展、集期和数量等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或华北集市进行了分析论述,可以说,学者们对近代华北集市问题的研究已经是硕果累累。

但是仔细分析这些论著我们会发现,它们的研究基本上都截至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地区的集市贸易问题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目前只有魏宏运先生的《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18]一文对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而关于晋察冀边区的集市贸易问题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文进行论述,只是在其它研究晋察冀边区的论著中有简单的介绍。如魏宏运先生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19]和苑书义主编的《河北经济史》第四册^[20]中对晋察冀边区的集市贸易有过一定的论述,此外在一些研究晋察冀边区的论文中也有所提及。但总的来说,这些论述大都篇幅较短,论述也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本文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之上,力图使用丰富的资料对晋察冀边区的集市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1章 集市的恢复和发展

晋察冀边区的集市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该区域从抗战前、抗战初期到边区建立之后，集市贸易的变化非常大，本章试图通过所掌握的材料对边区集市贸易的做出比较系统的梳理。

1.1 抗战前华北地区集市贸易概况

晋察冀边区地处华北，边区建立之初辖区只限于正太、同蒲、平汉、平绥4条铁路之间的山西东北部、察哈尔南部和河北西部的山区、半山区和冀中平原的部分地区，随着边区的不断发展，边区也扩展至绥远、热河、辽宁等省各一部的广大地区。到抗战胜利时，全区面积达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四千万，在164个县、27个旗、4个自治区（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21]P21}可以看出边区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华北，而且地形比较复杂，其境内物产丰富，盛产粮、棉、果品、海盐等，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而集市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近代华北集市情况从明清到民国经历了比较大的发展。明清以来，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华北集市基本上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态势。虽然鸦片战争已于1840年爆发，《南京条约》的签订已经使中国逐步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顽强的中国乡村经济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原有的形态，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很小，集市的发展也没有脱离原来的趋势，从集市的结构到集市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华北集市的变化与前一时期相比较为显著，这既是近代社会激荡的结果，也是集市内在发展的必然。^[11]这一变化首先可以从集市数量上的变化反映出来。

表1：明清到民国时期晋、冀、鲁、豫四省集市统计表

年代		1550-1734	1736-1795	1796-1861	1862-1911	1912-1937	
山 东	已搜集 到资料 的县的 情况	县数	43	50	27	47	48
		集市数	606	970	608	1379	1908
		平均每 县集市 数	14.1	19.4	22.5	29.3	39.8
	省籍县数		104	107	107	107	107
	推算集市数		1466	2076	2409	3139	4253
	已搜集	县数	79	56	20	76	53

河北	到资料的县的情况	集市数	730	678	256	1088	1081
		平均每县集市数	9.2	12.1	12.8	14.3	20.4
	省辖县数		130	130	130	130	130
	推算集市数		1201	1574	1664	1861	2652
山西	已搜集到资料的县的情况	县数	14	27	31	32	18
		集市数	83	187	228	255	144
		平均每县集市数	5.93	6.93	7.35	7.97	8.00
	省辖县数		101	101	101	101	101
	推算集市数		599	700	743	805	808
河南	已搜集到资料的县的情况	县数	22	30	45	18	16
		集市数	401	796	1228	510	580
		平均每县集市数	18.2	26.5	27.3	28.3	36.3
	省辖县数		108	108	108	107	111
	推算集市数		1969	2866	2947	3032	4024

资料来源：河北、山东统计资料来源于 Gilbert Rozmon: Population Marketing Setting in Ch'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4-138. 河南、山西统计资料来源于各县清朝或民国县志。转引自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一期；

根据上表的统计资料，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出华北地区从明清到民国时期集市数量的变化，在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四省集市数量都处于缓慢发展之中，70 年代之后，集市数量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民国初期，除山西外，其他各省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根据慈鸿飞的统计推算，19 世纪下半叶河北省拥有镇集 1785 个，而 1933-1934 年已拥有 3066 个，增长高达 78.8%，而山东 19 世纪下半叶为 2150 个，到 20 世纪 30 年代更是达到 7409 个，涨幅高达 215%。^[12]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中叶华北地区的集市总数在七八千左右，清末则达到近 9000 个，到了民国前期更是上升到 12000 个左右。在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市 1913 个，若就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来说，则达到 24.2 个，这就表明了到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集市网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密度。

近代华北地区的集市除了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变化之外，其集市结构也有明显的变化。第一，表现在集市上出售商品的结构变化。集市的建立原本是为满足农民自身生产

生活需求，其所售商品大部分也为农民自身生产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进入近代以后，外国商品开始逐渐进入乡村集市，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外国货物开始大量充斥华北乡村集市。在1867到1871年，洋纱输入华北只占全国总量的0.5%，而1884到1888年则达19.6%，而同期的华南则由97.9%下降到63.6%。^{[22]P197}第二，乡村集市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的销售市场，也成为他们在中国掠夺原材料的集散地。大量的农产品作为原材料从乡村集市运往通商口岸，最后进入国际市场。在冀中产棉地区，某些地区农民甚至把土地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种植棉花，替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生产原料，同时影响所及，不但日用工业品须从市场购买，甚至粮食都主要依靠输入，都仰给于市场。^[23]第三，随着商品结构的变化，华北乡村集市的参与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传统赶集的人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市民，而近代以后，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入，买办阶级逐渐进入乡村集市，他们把外国商品带到集市上销售，把原材料从集市上收购汇聚使其进入国际市场。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之后，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乡村集市贸易。

总的来说，晋察冀边区所处的华北地区进入近代以来，从集市数量到商品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集市数量增多，结构日益复杂。但是这些变化都深受各帝国主义影响，可以说，“七七”事变以前，整个晋察冀边区的经济都在日益向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前进。

1.2 晋察冀边区集市的恢复和发展

“七七”事变之后，广大华北地区迅速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其在华北长达八年的统治。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开始对华北经济进行大肆掠夺，华北经济迅速衰落，集市贸易也迅速萎缩。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处于一片混乱，聂荣臻回忆，“晋东北地区，除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24]P366}

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各地集市根本不可能正常进行，即使勉强能够开市的地方，其规模也远不如前，最后逐渐走向衰落。如张家口的洗马林镇从清康熙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其传统商品经济就异常繁荣，素有“旱码头”之称。其工商业以粮食、油料加工业为主体。“‘七七’事变之后，一时黑云压城，外七县被占粮食油料被卡，不能下坝，洗马林粮店成了无源之水，日子越来越不景气，渐渐不能支撑不久也便瘫痪。”^{[25]P226}还

有玉田县的林南仓镇，自明清以来就因交通发达，人口稠密，市面繁荣，集市贸易兴盛，而有京东第一镇之称。林南仓镇商业最为发达。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京、津、唐之间的重要贸易市场之一。全镇共有商店44家，其中杂货店7家、酒烧锅4家、中西药店4家、书局3家、海货店1家、旅馆2家、席行18家。林南仓镇自明清以来日趋兴盛，进入民国达到鼎盛时期。“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京东重镇林南仓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日趋衰落，一天不如一天了。^{[26]P281-282} 丰润县的左家坞在日本侵占之前，已经成为全县颇为繁华的集镇，其买卖街在方圆数十里也名声大震。1920年后，左家坞买卖街店铺鳞次栉比，生意兴隆，正是鼎盛时期。1933年5月，侵华日军的铁蹄踏进了丰润，并在左家坞的建立了据点。日军进驻后，宪兵随意闯入各买卖店铺，肆意抢掠。繁华的买卖街惶恐了，小贩的叫卖声低沉了。许多外地、外村开买卖的大多关门停业，当地自营者也有有的变卖了资产。车马店关门，商客不敢再来，集市冷落，买卖街萧条。后来几十家买卖只剩下一两家难以迁走，勉强维持着生意。然而日寇并不因此放松骚扰，而且更加猖狂。1938年竟放火将刘玉峰家的店铺烧个精光。店铺被日军占领和毁坏之后，集市也随之冷落萧条了。人们偶尔到左家坞赶趟集，也是提心吊胆。^{[27]P284-285} 可见，“七七”事变之后，甚至更早，只要被日军占领，当地的工商业便中断了原有的发展脉络，迅速衰落，集市也随之萧条，甚至消失。

1937年10月27日，按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五台成立，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11月7日军区司令部宣布公开。边区成立之后，在力图军事政治稳固的前提下，同时开始了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以确保边区长久发展。边区建立伊始就针对当时边区的经济情况明确了经济任务：第一，它能够在经济上充实国防，加强抗日力量；第二，它能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第三，它能够改善和增进人民生活，巩固统一战线，保证战时的总动员。^{[28]P238-239}

1938年边区政权已逐步稳固，经济也逐渐恢复。1939年4月，边区又公布了题目为《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纲领而奋斗》的边区经济建设的原则方案，这个方案科学地阐明了敌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明确规定了敌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各项任务，是根据地创建初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完善和发展。

在商业方面，方案认为“随着生产事业的发达，我们的贸易也会逐渐繁荣起来”，

方案提倡进行“公私合营，尽量地吸收私人资本”，还在“各专员公署实业科之下，设专人负责贸易工作”。^{[29]P254-256}在这个方案之下，为了进一步活跃边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边区政府开始着手恢复和建立边区的市场体系。1941年初，边区政府提出了“于适当地点建立新市场，以供军需民用”，并“恢复原有集市，以繁荣边区市场”的工作要求。^{[30]P536-537}

由于边区大部分地区为农村，而集市又是农村市场的主体，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边区政府对边区市场经济的恢复和建立主要体现在对边区集市和庙会的恢复和建立上。

传统集市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区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而边区集市的恢复和建立除了调剂农民余缺之外，还肩负着其他特殊任务，在边区贸易工作布置大纲中提到“破坏敌据点集市，于其附近建立活动市场，以粉碎其以战养战的阴谋”。^{[30]P536-537}可见边区集市的恢复与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抗战的需要，恢复和建立集市的目的是军需和民用相结合的。集市的繁荣必然促进边区市场的繁荣，市场的繁荣也必然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这样以来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破坏敌人据点集市的目的是更加明显，这就是要打击敌伪经济，以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

庙会集市的一种特殊形式，清人柴桑说：“交易于市者，南方为之趁墟，北方为之赶集，又为之赶会，京师则为之赶庙。”^[31]庙会是在农村补充农民在市场上交换不足的重要形式，交换物资不仅比普通集市数量大，而且种类多，它是手工业和农村生产的结合，以手工业者和农民交换为最多，特别是在春季，农村手工业者大量出售产品，农民为农村生产和副业生产准备生产工具，所以庙会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其重大作用。但是庙会除了其商业功能之外，还有很强的文化功能。在庙会上一般都会有一些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同时还有唱戏等娱乐节目。一般来说，城镇中的庙会其娱乐色彩较浓，乡村庙会其商业色彩则更重一些。

边区恢复各地庙会主要是恢复其商业功能，淡化了其娱乐功能，更禁止了带有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此外还要“活跃境内贸易，并与敌伪作市场争夺战”，^{[32]P422}可见，恢复庙会与恢复建立集市之目的并无本质差别。总的来说，无论是集市还是庙会，边区对其进行恢复和建立的目的都是为了调剂边区内部物资，以供给军需民用，发展边区经济，并且还肩负打击敌伪市场和经济以支援抗战的目的。所以边区集市和庙会的主要功能也

是其商业功能，其传统的迷信活动基本被禁止。1941年4月25日，边区行政委员会认识到“边区内部贸易之活跃端赖市场之繁荣，在昔边区各地庙会实为边区市场主要形式之一，抗战之后皆形停辍，现贸易局为繁荣边区市场，已通令各级贸易局开始恢复庙会”，“各级政府应将恢复庙会工作作为贸易之领导与协助贸易局办理之，并通过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商，共同进行为建立与繁荣边区市场，并与敌伪市场争夺战而斗争”。^{[32] P422}

边区指令下达以后，各专区纷纷响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恢复原有集市和庙会，并在适当的地点建立新的集市。集市的建立，游击区比巩固区要困难。游击区建立集市大体分三步举行：第一步，区公所根据本区村庄具体情况划分成若干小集区；第二步，区公所分头到各小集区召集小集区村干部会议，以座谈方式对村干部进行动员，通过村干部对商民进行宣传教育，揭示敌人统制集市之阴谋，说明赶据点集的危险，启发群众认识建立小集与民众利益的关系；第三步，协助小集建立集市委员会，规定集期与集市规则。^{[19] P271-274}而在巩固区，集市庙会的恢复和建立相对要容易，建立新集市时，一般选择地理条件与群众条件较好的地点，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增加赶集人数，还进行宣传。如孟县泰山庙会在恢复之前，“一专区贸易局为繁荣专区市场，活跃境内贸易，决定恢复境内贸易，决定恢复各地庙会，五月四日由专区贸易局、合同专区各团体共同协商，议定首先恢复孟县御枣口泰山庙会（过去为孟县最大庙会之一），并当即组织庙会委员会，推定娱乐、总务、募捐、借贷等五股负责同志定本月十×日至十×日定为会期，同时还详细讨论了准备工作。^[33]可见，各地在庙会恢复和建立的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集市的恢复建立工作由各地贸易局负责，各局在事先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对原有集市、庙会的情形进行调查，在恢复建立之前进行必要的宣传，并号召内部和外部的商民前来赶集或赶会，各集还联合当地政府对集、会的商品，会场秩序与警备问题进行提前准备和布置，为集市、庙会的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各地政府与群众的共同努力，1941年，边区的集市体系初步形成，庙会也纷纷恢复。当然，集市与庙会的恢复与繁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集市的恢复与建立工作都在进行。如1942年6月，龙华为繁荣本地市场，决定恢复境内所有庙会。1948年3月，冀中行政公署还下达了“关于恢复和繁荣庙会的指示”，并提出“庙会是永远的，不只是今年恢复”。^[34]边区集市从衰落到恢复和发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这些集市之所以能够恢复与发展是与

边区各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相适应的，正是由于边区整体经济的发展，集市才能随之发展与繁荣。

第2章 集市的管理与改造

边区集市是在抗战时期恢复和建立的，边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又有巩固区和游击区之分，敌我双方又互相施行了各种经济限制，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边区集市与传统集市相比，具有很多的独特性。本部分笔者试图通过对集市贸易的各主要要素进行分析，以比较全面地展现晋察冀边区集市贸易的情形，根据对史料的分析，归纳边区集市与传统集市的不同，并总结其特点。

2.1 集市管理与运作方式

2.1.1 传统集市的管理运作

集市是人们聚集买卖场所，一般来说，大集的辐射范围可达几十里，小集的辐射范围也可以达到十几里，大集的人数可以达到一两万人，小集也有几百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商业贸易要正常进行必须要有一定的管理。对于官府来说，如何维持集市的正常的交易秩序，促进集市的发展，既是其职责之一，也是地方为官者政绩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集市作为人们从事交往活动的重要社区，还关系到地方的民风及社会治安问题。因此，明清以来各级官府，尤其是地方官都对集市实施一定程度的管理和控制。^[36] 地方政府对集市的管理主要表现在对集市交易度量衡斛斗秤尺的统一和管理以及对集市交易秩序的整顿与维护。如河南兰阳县“内有县市外有集市，斛斗秤尺，官为校勘，而论者鲜焉”。^[36] 到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度量衡之混乱，专门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对度量衡的管理还设有专门机构，成立了度量衡检定所，在山东馆陶（现属河北）“民国二十二年冬十月，馆陶度量衡鉴定所成立，……主任及检定员与城关集期或乡镇集所随时检定度量衡，依照公制改制新器，以便市用而照划一。”^[37]

但是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设置有关管理乡村集市的官方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多是通过各集牙纪与集市发生联系，包商从县府包揽一定范围内集市的税收，牙纪控制着所在集市的度量衡，充当交易的中介人，负责收缴各行的牙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集市各类物品的价格。牙纪多是由地方权势人物作保而产生的，牙纪产生的社会背景决定着他们在集市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也常常充当集市中调解纠纷，维持秩序的角色。因此，真正对集市发生有效影响的是牙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些

省区也曾订立过有关集市的统一章程，而这些章程的具体实施者也是牙纪。^{[3]P50-51}官府派人对市场进行检查，名曰集头，在直隶威县集头“在城集额设一名，专一管理市政，同度量衡”，“在乡七集，各设一名”。^[38]

总的来说，传统集市的管理主要是依靠牙纪来进行的，而各政府所谓的管理也只是委托税收和制定度量衡而已，基本上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来履行管理之责，因此很难对集市进行真正有效的管理。

2.1.2 边区集市的管理

边区政府建立之后，由于军队的给养与集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十分重视对乡村集市的管理，在管理工作中也有很多创举。边区政府在各县都成立了贸易机关，1939年9月，边区“为管理边区贸易事业，制止仇货输入，并将土产货物作有计划的输出起见，普遍设立贸易机关”。^{[39]P348}边区恢复集市和庙会之后，各贸易局的贸易管理员的工作之一便是对集市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贸易管理员应将境内重要物资之物价变动（如米麦玉米食盐棉布等）及敌我货币变化，按旬表报县府转报边区行政委员会，其有突然巨大变动，应将变化情形及其原因立即报告县政府转电边委会。并应选择境内中心集市一个，将大宗货物及日用必须品的物价变动，按月表报县政府转报边区行政委员会。贸易管理员应深入研究市场，具体了解境内市场，各集市在经济上所处之地位，在政治上所处之环境，所售商品之种类价格及销售情形，所有商品之来源去路，及贩运方法；以及集市上的不同季节变化，管理组织办法，牙纪活动佣钱，奸商垄断操纵货币流通，敌伪扰乱破坏情形，都须仔细调查，系统记载，交由县政府转报边区行政委员会。这项工作是一点一滴的经常不断的工作，同时着手，事实绝不可能。应从重要的集市开始，一个一个进行调查研究，少说主观的理论空话，多写实际的考查与访问。^{[40]P435-436}

有这样细致入微的工作，边区政府就可以很好的对集市进行有效、有力的管理。为了加强集市管理，所有的集市都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大集市设市公所，小集在村政权下设集市管理委员会，集市管理委员会中的干部不脱产。市公所的工作主要是：（1）掌握与组织实现贸易政策，办理贸易行政。（2）组织商人牙纪，教育商人牙纪，通过商人进行城市工作。（3）与商店（公、私）取得密切联系以稳定物价。（4）管理对敌贸易，征收出入口税。（5）调查分析研究市场上的商品及农工业（生产与消费数）。（6）贯彻货币一元化政策，肃清伪钞，禁用白银。（7）组织缉私组，加强领导，处理纠纷，没收、

罚款等事情。(8) 管理集市治安、保卫、宣教、卫生等等。

市公所在上级贸易管理领导下掌握原则，市公所与区公所有一定的关系（参加区务会等），贸易管理局是双重领导，市公所中心是管理集市，有时可在附近村做缉私工作，市公所与贸易管理员在配备中心工作时，应以集市贸易为主，不能以其他工作限制住他本身的工作，当然在妨碍本身工作的原则下，配合其他工作是可以的，而且应尽可能的来配备，市公所与贸易管理局在同级政府与上级抵触时执行贸易本组织系统的，同时向上级反映。^{[41]P707-708}

各集市管理委员会的宗旨是以执行贸易政策，保证境内贸易自由，严防物资资敌，巩固繁荣市场，并团结内外商人。集委会由贸易管理卡、区公所、公安局、检查站、区群众团体、集市商救会、村公所，各派一名代表组成，集委会设正副主任各一名，管理卡的代表由正主任担任，副主任由其他代表推选，其余人为委员。市公所集市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对集市的管理步入正轨。在《集市管理委员会组织简章草案》明确地规定了集委会的任务和分工，其任务是：（1）管理牙纪（规定牙纪人数与佣钱）；（2）团结内外商人，适当的替商人解决各种困难；（3）调节市场纠纷；（4）稽征；（5）对敌警戒（接近游击区或游击区市场）；（6）维持市场秩序；（7）取缔奸商操纵居奇；（8）调查市场。其分工为：（1）贸易管理卡负责市场地区选择，划分贸易区，规定集期，稽征，管理牙纪，调解纠纷，调查市场；（2）区公所负责审查登记牙纪，办理违法案件；（3）派出所维持市场秩序，除奸；（4）武装部负责对敌警戒；（5）本会委员均有团结人之责任，但集市商救会与贸易管理卡负主要责任。^{[42]P719-720}

但是在搜集到的材料中一般集市的管理机构都是集市管理委员会，成立市公所的集市并不是很多。一般来说，集市上的一切事宜都由集委会负责，比较大的集市由区公所直接负责。集市仍存在牙纪。但是牙纪需要由集市管理委员会提名，由区公所审查产生。可以说，边区政府在集市的管理中有很强的影响，但是还是需要当地有权势的各行牙纪的支持与参与。

一些重点集市还设立交易所，交易所是工商部门的下属行政组织，在行政上受工商局的直接领导，对工商局所负责。在业务上，受商店领导，物价由商店掌握，业务上对商店负责，商店通过交易所吞吐物资。同时，交易所还受集市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交易所的主任是集委会的委员，而集委会的主任可以参加交易所的工作。其组织上设主任、

保管、会计和交易员若干名其主要任务为掌握主要物资，公平组织成交，便利内外调剂，稳定物价，防止敌货内侵，在市场制度上，兴利除弊，以达到便商利民，便利公私经营繁荣的目的。^[43]交易所一般都建立在较大的集市所在地，一切大宗交易都必须经过交易所成交。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随着边区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交易所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1948年7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取消集市交易所统制交易权的通令》规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进行对敌斗争，稳定物价，制裁奸商投机操纵行为，在许多较大集市上，曾设置集市交易所，禁止私人开设行栈，规定一切大宗交易都必须经过交易所成交，在对敌斗争与稳定物价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现在由于解放区日益巩固扩大，工商业日益发展，物价日趋稳定，为了便利商民成交，保障内地贸易自由，过去交易所统制交易之特权，必须加以取消。”“自通令之日起，全区所有集市一律准许自由成交。任何交易所、私人行栈及交易员（牙纪），均不得加以限制。”“准许私人设立行栈。”^{[44]P774}集市交易所被取消之后，商民在集市的交易更加便利，更进一步活跃了边区的市场。

庙会的管理机构是庙会管理委员会（有的叫庙会组织委员会），各地庙委会的组织机构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细小的区别。如定县庙会组织委员会“设正付主任，负责推动全面工作，下设四股，其分别是：（1）宣传股：负责庙会的宣传和检查旧艺人的工作。（2）募集股：负责募集庙会的必要开支，要本着取于民用于民的精神，事先有预算，不能铺张浪费，事后拉清单公布账目。（3）纠察股：负责维持庙会的秩序，如庙会上打架、争吵、纠纷及维持戏台的秩序，检查不合法的行为。如抓绑耍钱等骗人的勾当。（4）招待股：负责招待各村义务宣传队喝水，及远来剧团吃饭住宿等。”^{[45]P807}而张家口口的赐儿山庙会管理委员会则下设：治安股、宣教股、小商股、医救股、临时裁判股五个股。^{[46]P804}虽然这些组织分工多少有些区别，但是都大同小异，而且庙委会与集委会的职能也基本相似。

总的来说，晋察冀边区对集市与庙会的管理基本上是通过集市管理委员会和庙会管理委员会来进行的，与以前地方政府对集市的管理主要通过牙纪来实现具有明显的优点，集市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更加直接，也更有效，作为边区政府的下属机构其与政府的沟通当然比以前牙纪与政府的沟通要便利、快捷。集市管理委员会在其行使职责的同时，

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八路军或解放军每解放一地，当地就逐步建立了集委会。有了这样的机构，边区政府更好地控制和利用集市以满足军需民用。

2.1.3 对集市与庙会的调查工作

为了对集市的情况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边区政府经常进行各种细致的调查。每个集市管理委员会和交易所都有专门的交易员或贸易管理员对集市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涉及集期、货物种类、货币、交易额、商店、摊贩、牙纪等问题。交易员调查后将调查报告上报于各地方政府，由各地方政府转报给边区政府。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和其下属的各地方政府进行过多次市场和集市的调查。

1942年边区工商管理局在制定三、四、五、六、七月份的中心工作计划时就要求对边区的集市进行调查工作，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敌破坏市场与我××市场”，“敌我连接地区市场的物价、货币、贸易、商人来往路线及其关系”，“专区与专区之间调剂货物的种类、季节性与调剂上的特点（如换取物品、换取货币、边币、白洋、伪钞）”。^{[47]P707}1942

年11月，边区组织各地市场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市场调查，在其调查大纲中调查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一、市场的历史与环境；二、市场的现状；三、店铺摊贩与市场组织；四、市场管理。这四部分又分为若干条，如市场现状中有：（1）集期，赶集人数。

（2）货物（外货、土货、牲畜）、种类、数量来源、销路。（3）物价：抗战前的物价，抗战后的物价，目前物价。（4）货币：边币流通情形、数量、白洋、伪钞流通情形、数量、流通的方法。各种币价值（抗战后历年比值，今年每月比值，目前比值）。（5）度量衡制度：新制、旧制（斗注斤，秤注两）。（6）交易额：每集上市数量，每集交易额（调查最近几次每集情况），上年交易概数。铺上摊贩与商业组织又分为：（1）铺商（包括公私商店合作社等）：1.名称。2.铺主姓名及简历。3.资金。4.人数。5.成立年月。6.主要货物。7.货物来源及销路。8.每集交易额。9.上年交易额。10.盈亏。11.目前的状况。12.参加什么商业组织，对市场管理、税卡、牙纪等的意见。（2）摊贩：1.哪行哪业。2.姓名。3.籍贯，现在住址。4.资金。5.经营时间。6.主要货物。7.每集交易额，每月交易额。8.盈亏（每集，上半年）。9.一年中以何月买卖为最好与最差。10.货物来源及销路。11.目前的状况。12.参加什么商业组织，对市场管理、税卡、牙纪等的意见。（3）牙纪：1.哪行哪业。2.姓名。3.籍贯及现在住址。4.主事人姓名及略历、共有人数。5.手续费如何规定及全集收入数目。6.有无其他开支。7.手续费有无

偷漏情形。8. 已否经政府登记或受何人之委托。9. 参加什么商业组织, 对市场管理、税卡、牙纪等的意见。(4) 商业或商人组织: 1. 名称。2. 性质。3. 任务。4. 组织。5. 领导关系(与政府团体)。56. 作什么工作, 所起作用。7. 摊贩、铺商、牙纪及各方面之意见与反映。^[48]

从这些调查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边区政府对市场调查工作的重视, 而且在1945年还就市场调查不足进行了批评, 指出“对商人多少, 那行多少, 商业行别, 买卖大小, 供销情形, 集市到底有多大, 交易额到底有多少, 货物来自那里, 销到那里, 市场上的货物群众需要多少, 非群众需要的有多少, 各种货物的利润几成, 敌货多少, 以及物价掌握等, 都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41]P706}这虽然是批评调查工作做得不够深入, 但是也反映出边区政府对调查工作的重视。除了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专门的集市调查之外, 边区政府还建立了经济情报制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使边区获取市场情报的来源制度化。各专局和县长是经济情报的主要负责人, 每专署和县都要指定专人进行和搜集整理情报工作。当然所谓经济情报不是专指集市的情况, 但是市场情报是经济情报中重要的一项。经济情报的内容包括“货币比值的变化”, “小米价格”, “布棉价格食盐价格”^[49]这些内容的调查都是以各专区的几个市场为参考标准的, 制度的建立为边区市场的调查提供了保证, 使边区政府对市场的各种情况的了解更加系统完善。

总的来说, 边区政府通过经济情报制度和各种形式的市场调查, 对边区各地集市的状况有了非常透彻的了解, 这些来自实际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边区政府对集市的管理与指导提供了详细的依据, 使边区政府能够制定出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政策法规, 以促进和完善当地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2.1.4 边区集市的治安与保卫

晋察冀边区集市与传统集市的最大不同就是其时代背景的不同, 边区集市处于战争环境, 敌占区与边区犬牙交错。这种特殊的背景就决定了边区集市要想顺利地进行, 就必须对集市进行武装保护。边区集市有巩固区集市和游击区集市之分, 巩固区集市深在根据地腹地, 与敌占区距离较远其治安状况相对较好, 而游击区集市由于与敌占区相接触, 经常受到敌人的扫荡和破坏, 除了直接出兵进行破坏之外, 敌伪还派遣大量的特务到我集市进行破坏, 所以为了保证边区集市的顺利进行, 就必须加强集市的治安与保卫工作。

一般来说，各集市管理委员会都设立有治安一股来专门负责集市的治安与保卫工作。大部分地区都是集委会与当地公安局、民兵或其他武装力量相互配合来保卫集市的正常进行。如定襄、孟县、五台三处集市就是“由公安局自审队担任会场秩序的维护，进行岗哨、检查行人、商店等工作，以防敌探汉奸的深入”^[50]这是一般巩固区的作法，因为巩固区只需进行检查，以防特务汉奸破坏就可以了，一般不会有大规模的敌人前来破坏，而游击区的情况相对来说要复杂许多，前去集市破坏的有汉奸、特务、伪军，甚至会有大规模的敌人前来打击。因此“要有计划的主动加强岗哨，规定统一信号，要有转移道路，村游击小组多负责”。^{[41]P714}可以看出游击区集市的保卫任务要明显重于巩固区集市。

市公所和集委会还需要负责维持集市秩序，“市公所与贸管员根据上级的规定可单独处理问题，特殊条件（小偷汉奸），可拘押区廿四小时以内，处理不了送县，但尽可能不要押人。”^{[41]P708}有些地区的市公所还与当地派出所合并，共同维护集市秩序，但各县也并不一致，还有的治安员直接接受县公安科或区治安局的领导。“已合并者可称市公所的治安员，市长是直接领导的，当然也与公安科有它的直接关系，不过市长应很好领导，一切为作好工作出发，自然没问题，未合并者亦应取得密切联系，集市治安员主要是集市上的治安应很好了解商人，维持集市秩序。”^{[41]P708}

完善的治安制度对边区集市秩序的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阜平“党和政府为了让群众赶好集，县区政府在离集市几十里的地方站岗放哨，敌人来了赶快散集，敌人不来照常赶集，至今传为佳话。”^{[51]P579}还有雁北游击区的一个集市从1941年5月到1942年6月，先后被敌人抢夺十次，共抢走了十二万元的货物，使边区遭受了一些损失，在掌握了敌人出没的规律之后，边区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进行了保卫，“一次，我们碰到一个瞎子背着一袋粮食，由一个小孩子指引着路子。问他：‘敌人来了怎么办？’‘鬼子现在是不敢来的！’他肯定地自信地说。因为敌人每次出犯总是遭受意外打击的！六月中旬，敌人似乎下决心摧毁这市场，他们率领着走狗汉奸，赶着大车但是到村里见不到商人，见不到货物，好容易找到了一点货物都是枣和苇叶，他们发财和摧毁市场的目的都没达到，垂头丧气的把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抢回去，但行到孤山却又偏偏踏上了我们的地雷，炸死了六七名，使得他们以后不敢轻易出犯。”^[52]由此可见，边区不仅能够很好地打击敌人，保护集市，还能够非常准确的得到敌人的情报，了解敌人动向，做到事

半功倍。

边区集市良好的治安和敌伪集市的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敌占区的集市经常遭受敌伪的各种形式的掠夺，赶集的群众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敌人的集市大都围墙堵着，鬼子汉奸们站着岗，赶集的人来的时候，他假装不打不骂，等到你买好了东西回去的时候，他就和你出麻烦了，说布只准买五尺，你就只得要五尺，把剩下的一齐给他，说粮食不叫运走，你就得白花了钱，全部放下。赶集的人弄着粮食去卖，站岗的鬼子还会对你特别客气，点头敬礼，可是到了集上，贵贱你都得卖给他，那里有汉奸商人，专门替敌人拿着鬼子的票子收买，你要嫌价钱低，不肯卖，鬼子就不客气，打你的嘴巴了，有时说不定还会要了你的性命。”^[53]在徐水定兴“敌公开抢掠杨村集市，漕河据点敌伪将集市包围，只准空人走出，粮食等物都被抢去”。^[54]敌伪对其当地集市的蛮横抢掠和对赶集群众的威胁使得敌占区集市日渐萧条，因此敌伪就不得不使用强迫的办法让人们去赶集，如完县“敌伪不得不强迫各‘爱护村’村民替皇军‘装装门面’。于是把巷北村的民众以及正在耕地的拉粪的牲口，都强迫拉倒集上去‘摆样子’，强迫人们赶集凑热闹”。即使这样，由于敌人限制买卖自由，并设立了检问所，“于是人们更远远的离了它，敌伪的集市就更加萧条了。”^[55]敌伪集市的混乱与萧条更加衬托了边区集市治安管理的成绩，人们也纷纷前去过边区集市赶集，更加促进了边区集市的繁荣。

庙会作为特殊的集市，其规模一般要大于普通集市，因此其治安保卫工作就更加重要。一般情况下，庙会的治安工作由庙委会和当地武装部门共同进行。庙会上设纠察队或治安队，进行防空防特，调解纠纷。如任邱城里的庙会“为了防空设有防空瞭望哨三处，规定发现敌机时鸣号为令”，辛集由“公安局与武装部共同组成庙会治安指挥部，夜晚由街抽调民兵40名轮流巡查，岗岗放哨，（白天民兵即没有了）并与庙会联合发出治安纪律通知，这样一来保卫了庙会安全，此项工作城镇做的比较好，乡村则差，但为了保护商品的安全，夜间也有人看守。”^[56]可见，无论城镇庙会还是乡村庙会，其治安问题都是可以保障的，虽然乡村庙会由于武装力量不足，情况稍差，但是由于边区政府的重视，最起码的商品安全是可以保证的，这就增加了商民参加庙会的信心。

庙会会场秩序一般由庙委会直接下属的治安股或纠察股负责。在定县庙会组织委员会的纠察股“负责维持庙会的秩序，如庙会上打假、争吵纠纷及维持戏台的秩序，检查不合法的行为。如抓绑耍钱等骗人的行为。”^{[45]P809}正是由于庙会一般都会持续数天，其

交易规模比一般集市也大，而庙委会本身力量有限，所以它只是负责庙会会场秩序的保护，治安和合防止敌人的破坏工作就必须依靠公安局或武装部门来配合完成，这样才能保证庙会的正常进行，为庙会创造内部秩序和外部治安的双重良好环境。

总的来说，无论是集市还是庙会的治安管理工作，都是通过市公所、集委会或庙委会与当地公安部门或武装部队相互配合来实现的。残酷的战争环境要求集市保卫工作必须依靠较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来防止敌人的抢掠与破坏。边区集市完善的治安体系使得边区的集市、庙会在进行期间很少受到敌人的破坏，即使有敌人来进行破坏，要么提前得知情报进行转移，要么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良好的治安环境，吸引了大批边区和敌占区的群众商民前来参加，集市也日趋繁荣，与日趋萧条的敌伪集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打击了敌伪集市，又繁荣了边区商业，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2.1.5 集市交易费（税）的征收工作

交易费是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根据交易金额从中按一定比例抽取一定的金额作为税收。在传统集市上，交易费一般是作为牙纪的牙佣出现的，牙佣被牙纪所占有，交给政府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边区政府恢复集市后开始在集市交易时征收交易费，交易费也成为边区政府在集市上所征收的最重要的税种。交易费的征收目的主要是防止物资外溢，严格管理市场，杜绝流弊，便利商民交易，保证军需民用。

交易所是交易费征收的主要机构，交易所依靠各交易员征收交易费。交易所也是集市的管理部门之一，但它本身并不办理业务，只是办理与组织成交并代公营商店买卖。在交易所中设主任一名，领导全所人员，下设交易员若干名，交易员的产生有严格的规定：“群众观点强，大公无私，有交易常识者，（对过去吃私舞弊，我们不能看成是常识），合乎以上条件，经村新农会保证，工商所审查合格者，可以充任交易员，发给交易员袖章，交易员不称职，或不忠实职务时，工商所有权退照要求另选，村新农会出现交易员有毛病时，经过工商所同意，也可以撤回交易员，但主要是放在教育培养上，以后交易员，可定期更换。”交易员在待遇上“参考一般工作人员，确定最高数，适当掌握各行市，交易员可统一分工，但对工作积极者，可以奖励。”^[43]可见交易员从选拔、工作监督一直到其撤换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样就保证了交易员在征收交易费过程中的公平和公正，有效地防止了传统牙纪的营私舞弊，保护了商民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税收。

虽然交易费是针对买卖交易所收取的，但也并不是集市上的所有交易都要收取交易

费，交易费的征收对象只是特定的货物。一般集市需征收交易费的货物有牲畜、粮食、布棉等，如在冀东“凡买卖牲畜（牛、马、猪、羊、驴、骡等），不论是否出口或在边区内地使用，一律按成交价征收税款百分之五。牲畜买卖一经成交，即由买主负责向税务局或税务局委托机关缴纳税款，并由经证机关掣给行署颁发之税票以便稽查。”^{[57]P855}冀晋行署制定了斗秤布匹交易手续费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凡在本境内以斗秤交易及布匹交易，不论公私商贩、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及个人，悉以本办法交纳手续费”。“本办法所称之斗秤，系指五谷杂粮、大小米、红枣、棉花、绒毛、线、棉籽、山药、药材、麻、麻绳、花生、油、盐、碱、油料、油饼、硫磺、硝、瓜果、蔬菜、茶叶、烟叶等一切过斗量秤衡交易者均属之，布匹系指粗布、洋布、土布、各色条布等而言”，虽然规定需征收交易费的货物如此繁多，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关于这些货物的交易都要收取交易费，交易额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开始征收交易费，“凡以斗量（市斗）交易之物资，一律征费，但不足一市斗者免征（即一市斗以下或量过整斗后余未满足一斗者）”。“布匹交易定为一入一次购买不超过两匹，且系自用者，概不征费，其超过此数者，无论自用或转售，完全照征手续费。”“斗秤布匹交易费，按其成交实价征收2%，此外不准县区再有任何附加。”^{[58]P858}

从这项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集市上进行的小额交易是不用征收交易费的，这就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需求，而对大宗交易征收交易费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物资资敌，又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整个边区集市都需征收交易费，但是各行署征收交易费的税率是有差别的。

表2：冀晋、冀中、察哈尔行署交易费税率统计：

地区	税目	税(归政府)	佣(归牙纪)	合计	注
冀晋	牲畜	4%	1%	5%	只征第一次交易，只限于三、四专区，一、二专区不征
	布	2.6%	0.4%	3%	
冀中	牲畜	3%	1%	4%	此四种系由行署统一规定，普遍实行者
	棉花	2%	1%	3%	
	土布	2%	1%	3%	
	粮食	1%	1%	2%	
察哈尔	牲畜	4%	1%	5%	

资料来源：《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务史料选编》（第二辑下）第891页；

此项统计只是对各区交易费的税率进行了统计，并没有说明各区交易费的起征点，

下面就冀晋、冀中行署交易费的起征点做如下比较：

表 3：冀晋、冀中行署交易费起征点

地区	税目		起征点	何方负担	注
冀晋	牲畜		一头	买卖双方平均负担	
	土布		二匹	买方负担	各色条布、土布
	粮食		二大斗	买方负担	只限一、二专区征收
	烟		一盒	买方负担	
冀中	牲畜	马驴	一头	买方 3 分，卖方 2 分	
		猪	一口	买方 3 分，卖方 2 分	只征肥猪
		羊	二只	买方 3 分，卖方 2 分	
	粮食	各种粮食	二市斗	买方 1 分，卖方 1 分	
		花生	100 市斤	买方负担	
		芝麻	二市斗	买方负担	
	土布	窄面布	两匹	买方负担	
		宽面布	一匹	买方负担	
		口袋	十条	买方负担	只征饶阳深县登特产地区
	棉花	籽棉	十市斤	买方负担	
		皮面	五市斤	买方负担	

资料来源：《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务史料选编》（第二辑下）第 878-879 页；第 889 页；

从以上两表我们可以看出，交易费的税率、起征点及由谁负担各行署都不尽相同，各地区间缺乏必要的统一。如察哈尔只征牲畜税一种，而冀中则税目繁多。此外除了粮食、牲畜这些普遍的大宗交易需征收交易费外，各地还对当地特产交易征收交易费，如皮毛、白油、药材、油饼、大盐、蒜、白麻、猪毛等，各地特产征收交易费的税率也不尽相同。这种混乱状态引起各地群众许多怨言，因此，边区政府为了对交易费进行统一，“明令交易费准予征收并具体规定四种可征（不是必征）之费，并确定征收原则，授权各行署具体掌握，四种是牲畜（5%）、布匹（3%）、粮食（2%）、棉花（2%）。各行署根据地区法令及细则具体掌握，各县增减税目税率须报行署批准。”交易费的征收还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不妨碍生产运销的发展，经济繁荣的首要原则；（2）项目限于当地主产或特产，大宗交易，收入可观或群众旧有习惯者；（3）佣税不得超过敌伪或国

民党者，且不得妨碍群众交易，购入自用及小量贩运应予免征，其交易次数较多者，应限于一次（如布可盖戳）或降低税率（如粮棉），以免发生‘车轮税’现象。”统一税率之后，边区政府还对各地区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如“冀中的问题是减少税目，彻底克服混乱现象，冀晋则应更积极地适当地开辟可以开辟的税源……如冀西的棉花、花生、梨果，晋东北的粮食等，察哈尔环境较差，但亦应在可能范围内增辟之（如粮食及五分区之布均可考虑）”。^{[59]P896-897}边区政府的规定明确了各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明确统一了四种主要商品的税率，这一规定使之前相对比较混乱的各地交易费征收的情况得到改善，不但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使各地群众对交易费的征收有了可靠的依据，减少了群众的抱怨，保护了商民利益。

各地除了对征收交易费有明确规定之外，还对偷漏交易费的处罚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交易费的顺利征收。在冀东“凡未在集市买卖成交之牲畜，离上税地区较远者，限十日内到税务机关报税，否则以偷税论。不论公私商贩、机关、部队、团体买卖牲畜，如有偷税瞒价等事情发生，一经查获，即科以五倍以下之罚金。”^{[57]P855}冀晋行署规定：“在乡村未经牙纪成交者，为保证信用，亦须报告委托代收机关或个人纳费，倘逾期一日以不报，意图逃避或瞒价及偷购等行为者，一经查获或告发，除照章补费外，并科以应纳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之罚金。”“处罚应由纳费用人全部负责，当即缴纳。若牙纪从中舞弊合谋瞒费者，经查出后，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惩处，并取消其牙纪资格”。“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及个人查获瞒价、匿报、漏费等情，均需送交或报告当地政府或税局，一律不准自行处理，违者以贪污论处。”^{[58]P859}察哈尔规定“买主于货物成交之后，在三天内不向当地税务机关纳税，企图偷漏或使用旧票者，除应补税外，并科以应纳税款一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罚金”，“隐瞒价格者，除交应交之税外，并科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之罚金，其会同舞弊之牙纪，亦应同受处分。”^{[60]P861}冀中对“隐瞒不报或瞒价匿报，除追交应纳税佣外，并课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之罚金，由买卖双方负责。牙纪合谋者，除给以处罚外，并酌情撤销其牙纪资格。”^{[61]P863}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对隐瞒偷漏交易费的处罚的额度虽不尽相同，但是都是比较严厉的，而且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对共同舞弊营私之牙纪的处罚的规定，牙纪一旦会同买卖双方舞弊偷瞒交易费，就有被撤销牙纪从业资格的危险，这就使牙纪在舞弊时不得不慎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牙纪会同买卖双方营私舞弊，增加了税收收入。

与惩罚措施相对应的，各地对举报或查获偷漏税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奖励。如冀晋行署对“查获送交者奖以罚金之 30%”，“密报经查获者，奖予密报人罚金的 15%”。^{[56]P859}冀中对“查获送交政府者，奖以罚金发百分之三十”，“密报查获者，奖以罚金百分之十”。^{[62]P863}这种奖惩分明的规定有效的防止了偷漏交易费的发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总的来说，交易费的征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仅 1943 年上半年边区交易费的收入就达到六万五千石左右。并预计全年可收入十二到十四万石。下表是 1948 年边区对交易费收入统计。

表 4：1948 年边区交易费收入统计

地区	交易费	农业税	交易费占农业税百分比
冀晋	5 万石	68 万石	7.35%
冀中	10-12 万石	190 万石	5.26%-6.31%
察哈尔	1 万石	31 万石	3.23%
合计	16-18 万石	289 万石	5.52%-6.21%

资料来源：《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务史料选编》（第二辑下）第 892 页；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交易费的收入可以占到农业税收入的百分之六左右，在全边区是仅次于农业税的税收，而且 16 万石的税收可以满足大约两万军队的需求，大体相当于八十万农民的负担，比察哈尔全省收入的二分之一强，因此交易费的收入有效地增加了边区政府的收入。

第二，交易费的征收有效地带动了集市的管理工作。虽然如果不征收交易费也可以加强对集市的管理，但是在未征收交易费之前，除冀晋老区比较重视集市的管理工作之外，其他地区对集市的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冀中地区就普遍存在村干部吃干饭不办事，广大新区旧牙纪营私舞弊等情形，给集市的管理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但自从征收交易费之后，虽然有的地区干部从征收交易费出发，但是实际上确实加强了对集市的管理。如“冀中 1022 个集市，有 502 个经过初步或较彻底的管理。在已整理的集市九个集市中的统计，牙纪减少三分之一，冀晋改造过后的新牙纪已达三分之一，有的集市（定县郭村）已达五分之四。”经过改造后的集市中，牙纪的营私舞弊大大减少，而群众负担并未因征收交易费而增加，如冀晋定县郭村调查，征费前群众负担比征税后不少，冀中安平张敖、吴江在群众小组会上讨论交易费应否取消时，十二个小组一致同意保留，理由是：“这是征的牙纪的税，不然还得由农业分数上加征。”事实上，政府征税前牙纪要的不少，所以群众才认为是“征的牙纪的”。^{[60]P892}由此看出，边区政府对交易费的征

收，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却并未增加群众负担，而且还有力地带动了集市的管理，减少了牙纪的营私舞弊。

2.2 牙纪的改造

从清朝到民国，集市交易必须经过中间人“评议市价”，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协商成交价格，这种中间人成为经纪人，即牙纪。牙纪又有官牙与私牙之分，官牙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并发给牙贴以为凭证。牙纪在民国之前一直是乡村集市的直接管理者，牙纪在撮合交易时要抽取牙佣，并征收商税，以获取丰厚的回报。在长期把握集市的过程中，牙纪逐渐积攒了许多的恶习，他们与当地的地痞恶棍相互勾结，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中饱私囊。

边区政府建立之后，在恢复与建立庙会的同时，特别注意对旧有牙纪的改造和教育。在未经改造过的集市上，牙纪的营私舞弊非常厉害，多是个人吃私。如新镇“谁有办法赚钱，谁就是行家，越狡猾的牙纪，赚钱越多，老实人吃亏”。^{[63]P755}为了克服传统牙纪的各种弊端，边区政府对传统牙纪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与教育。

首先在牙纪的选择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充当牙纪，边区政府对牙纪的选择有一定的标准：1. 略有牙纪技术；2. 该行商贩拥护；3. 品行端正，能遵守政府法令。^{[64]P721}符合标准的各行牙纪，由集委会提出名单，再交区公所进行审查，符合标准者予以登记，然后在市场上公布。牙纪以行为单位成立小组，互推小组长一人，各组均由贸易局管理卡领导。各组组长负责掌握本行牙纪，牙纪有问题时，向上反映，教育牙纪为群众服务。买卖上要照顾客人。各组长在每集完毕之后还需向贸易局报告商情。

除了对牙纪的人员标准有严格的规定之外，边区政府还对牙纪的人数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原则上应按集市大小，上货多少添设，有的行太小，可适当合并，二行或几个行共设牙纪，有的行大，可适当多设，一般说牙纪分粮、布、牲口、棉线、山货、煤、猪、柴草等行”^{[41]P709}在很多集市牙纪的改造中，减少牙纪成为集市管理的关键，边区政府与各集委会、交易所一面进行登记了解，一面对牙纪进行宣传教育。号召牙纪专业生产，好牙纪让其继续工作，应减的牙纪，则动员专业，带好其他。如自动转业人数不足程度时，则由牙纪讨论谁应专业，然后凭条集中意见，经集委会审查后宣布专业名单。这种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安平县“向屯粮市牙纪一百三十五人，经干部带动专业者二十七人，后经牙纪分组讨论，减去四十三人，共计七十人，下余六十五人”。^{[65]P763}

牙纪在人数确定时还要兼顾本地牙纪与外地牙纪的比例，以照顾外来商人。

虽然经过选择确定的牙纪已经与传统牙纪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传统牙纪的恶习并没有完全消除。具体表现在“单纯的经手费，不負責任，吃英雄的，村干部包办的现象有的严重存在，影响到集市的发展，牙纪兼商人，牙纪勾结商人欺骗群众都是有的，还有的牙纪一点技术也不懂，甚至所谓单纯的‘政治领导’都是一些倾向，至于吃接吃钱也不在少数”。^{[41]P709}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制约牙纪的纪律：
1. 接受贸易管理卡之领导；2. 不得有违反政策法令之行为；3. 不得与奸商通同作弊或额外敲诈；4. 未经经手之交易，不得索取手续费。^{[66]P721} 冀晋行署还针对各集牙纪的弊端，提出共同议定公约“不吃黑钱、不勾结贩子、互相守信，并经常根据公约进行检讨”。^{[67]P741} 除了制定纪律和公约之外，还对牙纪征收手续费的多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一般牙纪手续费须以每集收入能维持一人二日生活不得超过此数，除规定外，不得有任何物质之索取。这些规定的出台从制度上约束了牙纪的各种弊端，一旦违反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被取消其牙纪资格，因此各集牙纪的营私舞弊行为大大减少。

经过改造之后，各行牙纪的素质都明显提高。在冀晋行署，“各个行市的牙纪，人人都有账本，每集完了，集中一处由总数内提出百分之二十，其余平均分配，十分贫寒者于提奖酌情照顾，牙纪们反映说：‘这样办法谁都不敢撒懒了’”，“有成绩赚钱多，吃英雄股不沾了，这种互助办法好”。“有的牙纪于牲畜交易后应收八百元，商贩说不好找，给一千元，则坚决不收，不但不领情，反而说：‘你要打我的饭碗了’”。^{[68]P741} 可见，经过改造和有了制度约束以后，各行牙纪感到了吃私舞弊的严重性，从而自觉遵守各种制度，有效的改善了集市管理。

除了进行硬性规定之外，边区政府还对牙纪进行教育。着重教育他们克服以前以捉人为能事的坏作风，并让他们树立为市场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作风，经过教育之后，很多牙纪开口就是“为群众服务”，不提“多少钱”。在束鹿拉伯集市，牙纪“经过教育，大有转变，知道了经纪也是为人民服务。征交易费是买卖双方对国家应付义务，是保护正当交易，取缔积弊，繁荣市场的意义，不是剥削经纪的钱，克服着过去和政府对立的思想，减少了吃私透漏现象，税收也大大增多了，后二月初五集上只收一百万零八千元，三月十日整理后收税二百二十五万元。”^[69]

总的来说，对牙纪进行改造是从制度上防止了牙纪的营私舞弊，而对其进行教育，

则是从思想上纠正了过去牙纪为自己谋利，与政府对立的思想，使其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作风。两者相互结合，共同在牙纪的改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对牙纪的成功改造，改善了边区集市的管理，使买卖更加顺畅，而且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对边区集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3章 集市的结构与交易

3.1 集市规模

集市数量、赶集人数多少、交易物品的广泛程度、交易量等是反映乡村集市规模的最直接的因素，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就看出某地集市发展的大致情况。一般情况下，集市持续的时间越长，集市的规模相对也比较大，一般中心集市的规模要大于中间集市，中间集市的规模则大于基层集市。在时间上，乡村集市在农忙时比较萧条，在农闲时和年节前则相对繁荣。在抗日战争之前，边区所在地区及整个华北地区的集市贸易是向前发展的，正如施坚雅所说“在前共产党的中国大部地区，定期市场体系的表现状况是健全的。民国时期，已建立的市场中大部分有所扩大，很多市场增加了新的集期。直到40年代，新的基层市场一直在建立，本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农村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定期市场，市场体系中引进的现代要素只是——或者说看上去只是使传统的火焰烧的更旺。”^{[4]P92}边区建立之后，着力对集市进行恢复和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对集市进行管理，使边区集市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虽然“边区没有什么大的市场，但小商业特别繁荣，每一个镇都摆设有很多的什物摊，逢到赶集的时候，拥挤、喧闹、简直成一个小都市。”^{[70]P465}

3.1.1 集市数量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政局混乱，各地集市迅速减少，很多敌占区集市自行消失，从数量上看，各地集市都有所减少。边区政府成立后，虽然对集市有所恢复，但在数量上远不如从前。如保定顺平在清代到民国时期，全县共有集市25个，“七七”事变之后，日军放火焚烧了顺平县城，日军在市场上掠夺和强购粮食、棉花、布匹等战略物资，强迫使用日伪钞票，高价推销日伪商品，致使日伪占领区集市萧条，许多集市自行关闭。而在边区，由于顺平当时是边区银行、卫生部、供给部、军区工业部、兵工厂等重要部门所在地，因此顺平县神南、大悲、杨家台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抗战时期的大集镇。此外边区政府还有计划的合并了一些小的集市，至1948年，全县集市简并为9个，即：城关、吴村、河口、安阳、大悲、常庄、马各庄、北城、白云。^{[71]P511}唐县在康熙年间有11个大集，到光绪三年有村集28个，民国时期发展为31个集点，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集市大减，县城集市受日伪限制，游击区集市不能正常贸易，只有川里、上苇、稻园、齐家佐、白河、大洋等解放区集市在抗日政权领导和保护下，仍能正常贸易。^{[72]P422}

边区的其它地区也都基本类似，在日军占领华北之后集市数量都大幅度减少，而边区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对集市进行恢复，还在适当地区建立新的集市。在冀中行署，在1947年，共有集市167个，其中边区可以控制的集市为76个，这样的集市一般是边币土货市场，由边区政府下属的集市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而敌占集市只有53个，其余集市为敌我相争夺的集市，而在我边区控制的集市中，新建数目全区共有四个：固安二个、津武一个、胜芳一个。^{[73]P744-746}虽然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得出边区集市总数，但是，根据现有材料可以看出，边区的集市在边区着手恢复和建立集市之后，其数量是呈明显上升趋势的。

3.1.2 集市大小

在传统集市中，集市从中心市场、中间市场到基层市场其规模逐渐减小，而且其分布也存在一定规律，但是边区集市由于其战争环境的影响，施坚雅的六边形理论难以套用。一般情况下，边区在巩固区有较大的集市，赶集的人数与货物的成交量都比较多，而在游击区集市规模相对较小。

首先，从赶集人数来看，庙会比普通集市人数要多，其赶集人数可达数万。如张家口口的赐儿山庙会“历年来赶会群众颇为踊跃，除张市大部市民外，还有宣化、怀来、张北各地群众商贩，总计每天在五万以上。”^{[46]P804}到1946年，赐儿山庙会比任何一年都热闹的多，到会人数大约十万上下。^{[74]P805}定县五区西平朱谷庙会赶会人数也达到十万人左右。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庙会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这在战争环境下的边区是相当不容易的。而普通集市其赶集人数与庙会相比较要逊色许多。即使比较大的集市，如阜平王快镇是边区的商业重镇，每逢集日“附近五十里内的阜、唐、曲各村老百姓都到这里来赶集，一到集日买者卖者总有万余人。”^[75]而新正二区长舌头的集“越来越热闹了，在最近每一集期上，前来赶集的商贩和卖货群众，都在三千以上”。^[76]由此可见，王快这样的大集镇，其赶集人数也不过万余人，而普通的集市其赶集人数一般都在数千人左右，还有一种村合作社的小集，其主要功能就是满足本村和邻村村民生产生活交换的需要，赶集的人主要是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很少有远处村庄的人来，其赶集人数则更少。总体来看，边区集市的赶集人数还是相当多的，反映了边区对集市管理的效果。

第二，集市铺位。大多数集点都处于当地的经济中心，经过长期经济的发展，当地一般都会有一部分固定的商铺存在，这些商铺不仅在集日营业，平常也对外营业。除了这些固定商铺之外，每逢集日，还会有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地流动商人或摊贩前来赶集。边区各地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在一些新建立的集市中，开始没有固定的商铺，它的商铺是随着集市的发展才逐渐建立的。如五台县李家庄的集市建立之后，随着集市的发展，各地群众才“陆续开办了油坊、磨面坊、饭铺、中药铺，还开办了贸易货栈，上市牲畜成交量多大五六百头”。^{[77]P236} 雁北地区一个自发的游击市场在建立之前还是一片荒漠丛林，市场建立之后，其规模逐渐扩大，成为边区大的市场之一，随着规模的扩大，“今天市场上已经有了×××家店栈，×家小铺，资本最多的有××××元白洋，顶低的××元白洋”。^[52] 在新建的市场发展一段时间之后也逐渐成为固定商铺与流动摊贩共同经营的集市局面。一般情况下，固定商铺的数量要小于流动摊贩，下表是北岳区对各主要市场及工商户进行的统计：

表 5：北岳区各主要市场及工商户进行统计表

数字 专别	项目	市场数			户数分类统计						
		大市场	小市场	合计	坐商	行商	摊贩	作坊	手工业	其他	合计
一专		10	4	14	698	344	1704	434	883	550	4613
二专		2	4	6	147	18	241	3	31	97	440
三专		22	44	66	3129	1352	2750	441	195	531	8300
四专		6	20	26	553	355	1018	195	206	37	2364
五专		9	2	11	926	143	1543	53	144	23	2832
六专		49	74	123	5453	2712	7256	1126	1795	707	18549
说明	1、一专缺大同、五专缺满城、三专缺昌宛、六专缺天镇 2、大市场工商户在百户以上，百户以下为小市场										

资料来源：《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第 779 页；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冀中各专区都是大小市场相结合，而在市场上，坐商的数量一般都少于摊贩的数量，坐商依托自己的店铺长期在集点进行经营，行商、摊贩、各行手工业者只是在集期或者会期才赶到各地进行买卖。其他地区的集市商户情况也都基本类似，如冀晋集市市场情况如下表：

表 6：冀晋行署市场工商户分类统计

解放前后	时间	坐商	摊贩	总数	备注
解放前		20	62	82	
	1947 年 12	110	460	570	

解放后	月				
	1948年1月	160	513	673	九十家故衣摊未计入
	比较	增八倍	增八倍半	增八倍强	

资料来源：《冀晋行署关于市场管理问题》，《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第738页；

从上表中，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冀晋行署境内的集市其摊贩数量也远大于坐商数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市场的坐商和摊贩数量在解放后都有八倍以上的增长，这也反映出了边区政府对集市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

在赶集的商人中，有附近村民，也有远道而来的商贩，如在任丘惠伯口的集市中，“远地商民大都提前一天赶到，根据四月二十二的了解，只惠伯口三个店内，就有安新、里县（蠡县）、景州、献县、徐水、浦口、任河、河间、高阳、赵县、韩村等地方的商民七十八人，来集上买卖物资”。^{[78]P773}边区集市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外地商民前来参加，辐射范围如此之广，说明边区内部的贸易是十分畅通的，这也符合边区“对外相对抵制，对内相对自由”^{[79]P371}的贸易政策。总得来说，边区集市的繁荣是依靠本地坐商和外地商人和各摊贩共同完成的，他们相互结合，缺一不可。

3.2 集市货物种类与交易量

乡村集市的功能主要是满足农村村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生活需求，集市上出售的货物也都主要是农民的剩余品和手工业品。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帝国主义的廉价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并走入乡村集市，各集市一度被洋货充斥。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侵占华北，1941年6月1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命令“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同年12月3日，更明确指示要以“加强对敌封锁，摧垮敌方持续作战企图”作为基本任务。其实“华北方面军在此之前，随着治安肃正对策的正规化，早已建立了对敌占领区内外敌人的封锁体制”。日军还“在铁路、水路、及主要道路的交叉地点和城市的出入口设置检查所，并派流动检查班进行巡逻，以监视和杜绝向敌区流出物资”。^{[80]P247-249}敌人在封锁必要物资的同时，还用一些奢侈品输入边区以换取边区物资。“凡是军火弹药、电器、材料、粮食、棉花、棉布、羊毛、麻、纸张、油墨、盐、糖、铅、锡、铜、铁、钨、各种医疗用品，火柴、烟卷、煤油、煤炭，各种机器零件等，都在被封锁之列。而对于非必需品，如化妆用的香粉香水，各种装饰品，各种毒物，则向我根据地内倾销，企图以此吸收我方物资”。^{[81]P666}而

同时我根据地有禁止这些非必需品入口，因此，在边区集市所售之货物大部分为土货。

边区集市上所售货物以粮食、牲畜、农具、布匹和日用必需品为主，此外还有特产、山货和各种食品等。首先在货物的准备上，每逢开集和庙会之前，各地贸易局、集委会、合作社或公营商店都会事先准备一定数量的货物，以保证集日或会期有充足的货物供应。五台泰山庙会在举办之前，“专区贸易局决定以两万元的货物出卖，其他附近贸易局合作社值亦将达两万余元，以充实繁荣市集”。^[33]北岳一专区“在货物的准备上，事先由筹委会将庙会日期通知各地合作社、贸易局、大小商贩、脚户等，让他们准备大批货物到期前往贸易，并由贸易局召集合作社及大小商贩商讨个售货的价格，以免价格上的冲突和奸商的高抬物价。”^[50]各贸易局这样在集、会前进行货物的准备，并在集市上进行销售，一方面繁荣了集市保证了集市的物资供应，为集市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各贸易局货物的出售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而且还抑制了部分奸商哄抬物价，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

边区集市的货物以粮食为大宗，边区的贸易政策规定在边区内部粮食可以自由贸易，这为集市上的粮食贸易提供了政策保证。如辛集“有大小粮店数家，一年成交八百石到一千石”。^{[82]P773}曲阳“在粮食市场上，有许多丰满的籽种”。^[83]边区集市上的充足的粮食供应与顺畅的粮食交易与敌伪集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敌伪集市上敌人经常大肆掠夺粮食，致使许多人不愿去赶敌伪的集市，为了吸取粮食，敌伪还进行降价“市上卖七元的小米，定价为三元，七十元一百斤的棉花，官价订三十元，并且上集时运入多少不限制，但买主每次只能买一斗，且须有购粮证，因此许多粮食卖不出，但亦不准运走，敌人强以‘官价’收去。”^[84]因此各地群众都不愿上集，敌伪集市也日益萧条，集市上的粮食日益短缺。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使得广大敌占区“各据点货物稀少，粮食绝迹”。^[85]“井陘矿区粮荒严重到极点，集上有钱买不到粮”。^[86]而边区集市上的粮食交易却异常红火。

在边区市场上交易的另一重要物资就是布棉。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边区集市所售之洋布数量大为减少，而土布则成为布匹交易的大宗。在繁峙游击市场“国营商店日销售土布最高额达到白洋 1.5 万元”^{[87]P239}在第四专区，布棉的交易量每集能够达到数万元。小集每集的布棉交易也有 2000 元左右，即使村合作社创办的小集“一个集也可做二百斤棉花的生意”。^[88]由于边区政府对粮食的交易制定了各种政策，并且成立了平柴局专门进行粮食的买卖，因此布棉在集市上的交易量就大于粮食，因此在好多集市上布

棉的交易量都居于第一位。

在集市上的交易额能够与布棉交易相抗衡的就是牲畜交易。边区大部分地区为农村或山区，牲畜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牲畜在集市上的交易也极为活跃，除了布棉交易额居第一位的集市之外，其余集市大部分交易额居第一位的就是牲畜交易。各地贸易局在准备货物时，牲畜的准备是必须的在繁峙的游击市场每集上市的牲畜就达300余头，在第四专区统计的13个集市中，牲畜交易额居第一位的就达6个，可见牲畜交易之繁荣。

此外，山货、各地特产、农具、日用必需品也是边区集市上的主要货物，群众在集市上出售山货及当地特产以换取生产生活所需的农具和日用必需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在集市上比较活跃的就是各种小吃摊或杂货摊，一般这种小吃摊庙会要多于普通集市。在新正长舌头的集上“短街的大路两旁长长的蔬菜摊上，罗列成驮的整担的萝卜、甘蓝、大葱、大蒜……正被一拥一拥的顾客买在筐子里”，“集上，卖食品的摊子一向是特别多的，这是因为几乎每个远近的赶集人，都会在这里亮亮口味的。因此，单是十来家卖油炸糕的摊子，每集都可以卖过千余元。其他三四十处卖别样食品的摊子更不止此数”。^[76]这只是一个普通集市上的情形，庙会上的食品摊的规模要大许多，在曲阳下河庙会上“食品市上，两旁饭棚都是满座”。^[83]可见庙会由于其人数较多，其食品摊的规模也明显大于普通集市。

除了各商店、摊贩在集市上进行货物的销售外，边区政府还经常在集市上组织各种工业品展览会、土货展览会和农业展览会。在展览会上销售的商品大部分都是边区自己生产的，又是当地群众所必须的。展览会的组织形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由手工业户自己主持的，各行出人参加，讨论出应展览的产品，登记后即行展览；一种是由工商局和推进社联合高小学生参加负责。如在辛集工业产品展览会上，“展览的产品除工业生产产品以外，如任邱则有土货和农作物的种子，工业产品还是辛集为最多，参加展览的12行计13户展览物品工七十四种，完全是本市产品”，为了使参观的群众更好的认识货物，主办方还“在展览会上制说明解，写清成品的价值，优点及生产过程与方法，出品地点与厂名”，参观人数很多，如“伍仁桥一天的统计即达2550人”。^[86]这就大大地丰富了集市货物的种类，又促进边区工农业的发展。

如此多的货物种类，其交易量是相当可观的。第四专区对境内的13个集市进行了统计。

表 7：第四专区巩固区市场调查概况一览

地点 \ 项别		一九四三年（12 月份）平均每集交换额						合计
		粮食	布棉	食盐	牲畜	山货	蔬菜及其他	
完县	西安阳	6750	9500	5500	14000	5700	12120	53570
	口毛口	13500	19300	5000	30000	22380	22380	103180
	北大悲	6750	2500	1200	4000	750	7650	22850
	北神南	123000	12000	1150	12000	1440	11390	161130
云彪	土玄山	4800	10000	4300	8000	3200	13400	43700
定唐	马庄	18000	186000	6700	40000	12000	23500	286200
唐县	白合	7000	3200	1340	4000	8600	59400	83540
	南齐家佐	36000	14000	2400	46000	3200	19400	120900
	军城	12000	1700	800	4000	5000	54100	24410
	川里	24000	1900	6000			1000	37500
	蟒楠	18000	1800	300			5000	40600
曲阳	邓家店	638550	706876	12520	170830	36830	607450	2173056
	韩家峪	6800	6500	1300	7000	12100	5550	39250
	齐村	12000	13000	4000	8000	800	91000	46400

资料来源：《晋察冀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工商合作编》第 659-660 页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各集交易量相差很多，这也符合边区大小集市相互结合的特点。牲畜、布棉和粮食是集市交易的主要商品，其交易额也最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边区内部集市的交易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粮食、布棉这样的重要物资可以在集市上进行自由交易，在很大程度上调剂了边区内部的物资余缺，也反映了边区对集市管理的成效。

各地商店在集期或会期的交易量由于人口流动的增加也明显要大于平时。从下表对辛集的几个商店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

表 8：辛集几个重点行业重点交易数目的统计

行业	字号	平日每日交易额	庙期每日交易额	主要经营货物
职工合作社		270 万	366 万	洋钉、毛巾、牙刷、灯油
鞭子铺	义和成	55 万	166 万	
竹货铺	开利	11 万	29 万	竹筛子
饭铺	义生楼	21 万	60 万	
杂货	元丰	319 万	558 万	

货栈	志诚	126 万	496 万	
合计	6 家	802 万	1695 万	

资料来源：《冀中行署关于辛集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情况》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5-1-244-6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庙会期间，各店铺的交易额要远大于平日交易额，从6家店铺的交易额总计来看，庙期交易额是平日的两倍还多。

总的来说，边区集市上的货物以土货为主，尤以牲畜、布棉、粮食为大宗，三者交易额占集市交易额的60%还多。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很多工业产品都改为自行生产或使用替代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边区内部贸易自由的政策，边区集市的货物供应量也很充足，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没用出现敌伪集市上物资匮乏的现象。在边区对集市合理的管理与边区的贸易政策下，边区集市还有效的防止了烟、酒、香皂、化妆品、烧纸、锡箔等非必需品的出现。

3.3 公营商店

公营商店是边区政府兴办的商店，是边区政府组织商民进行物资交换的领导力量，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公营商店以“执行贸易政策，团结扶助商人，发展边区商业，供给战时军需，调剂人民日用，提倡推销土货，扶植土著工业的生产，粉碎敌人经济进攻为宗旨”。^{[89]P499} 公营商店在行政上受同级政府领导，业务上受上级业务局领导。公营商店在集市上所负的任务，供给不足，收买剩余，调剂物价，繁荣市场。公营商店的营利原则是区分交易对象的，对敌贸易营利愈大愈好，好友则以双方都有利为原则，对内则不求营利，主要起到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的作用，对小贩的交易按市价公平交易。1941年在北岳区出现了以旧商号命名的公营商店，1941年8月专区贸易局“全改为公营商店，县贸易局原有的私资参加公私合营，或动员到其他生产部门，听其自便。公私合营商店里的公资由专区公营商店以股资金多负监督责任，各县除公私合营的商店以外，必要时成立公营商店或成立专区公营商店的直属分店而受其指挥。”^{[90]P429} 此后，边区各地公营商店纷纷成立，下面是三专区公营商店的设置情况：

表9：三专区商店设置情形表

店别	名称	设立地点	资金	主要业务
总店	万聚隆	易县南营头	250000	调剂与运输
分店	同兴隆	龙华五区良岗	300000	调剂与运输各占50%
独立分店	宏济号	满城二区石井	210000	调剂与运输各占50%

分店	中兴裕	易县六区山北	200000	采购占 85%运输调剂占 15%
分店	裕原成	涞源二区银坊	160000	调剂与运输各占 50%
分店	福源号	涞源三区走马 驭	250000	调剂
分店	聚兴隆	龙华四区南城 寺	200000	调剂运输

资料来源：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第 258 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些公营商店的主要业务就是调剂、运输和采购。公营商店把本地特产运到需要的地区，然后换回本地所需物资在集市上进行出售，这样既满足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又活跃了边区内部的贸易。

一般在集市、庙会之前各公营商店都会准备一定数量的货物以供集市上销售。在货物短缺时，公营商店就可以用大量的货物作为基础来平抑物价，而当剩余物资过多时，公营商店会大量吸收，防止物价下跌。如冀中“在秋季征收当中，为了解决某些群众缴粮的困难，公营的裕华、华东商店和河间的利民货栈，出卖了大批粮食，对于稳定粮价，起了不少作用。”“辛集市场粮价显涨，不少群众担心吃了亏，这时裕华粮店就拿出大批粮食出卖，一天卖了一万零九百一十二斤小麦，一千一百一十二斤小米和一千七百五十五斤红粮，把显涨的粮价稳定住了。”^[91]可见，公营商店在集市上平抑物价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公营商店作为边区政府经营的商店，其在调剂边区物资，满足军需民用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商店大都处于集点或会点，他们在集上出售人民群众所急需的各种物资，并吸收农民的剩余物资，对集市的物资供应、稳定物价有重大的意义。

第4章 集市的政治宣传功能与集市上的对敌斗争

4.1 边区集市的娱乐与宣传功能

传统的普通集市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交易以满足农民需求，规模较大的庙会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当地人有时会请戏班进行演出，这也是传统庙会的主要娱乐项目，甚至有的庙会还有很强的祭祀功能，很多庙会都是从祭祀发展而来。如张北的莲花滩“自乾隆三十年建庙以来，关帝庙晨钟暮鼓，每天都有善男信女来供神、许愿、问医、讨药、求雨驱魔、修德，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在此基础上，一年一度二十三盛大的莲花滩庙会形成了。在清代，莲花滩庙会十分红火。庙会期间，四路八乡来进香的善男信女，摆摊设点的商人，购买杂什杂件的群众，人山人海。”^{[92]P268}可见这个庙会从其形成的基础到其形成发展与祭祀有密切的联系。庙会期间，大都要请戏，所以如此，一是为了酬神祈灵，作为崇拜信仰的一部分；二是为了满足百姓放松身心，调剂生活的娱乐性要求。^{[93]P193}

边区政府在恢复集市、庙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集市与庙会的娱乐功能，但是在娱乐之外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使集市、庙会的娱乐功能又增加了文化宣传功能。各集委会和庙委会一般都设立宣传股来专门负责集市、庙会的宣传工作。在集市上他们采取“黑板报、屋顶广播筒、漫画、标语等形式，其内容则为目前大事，发生问题，新的法令法规，商情报道（随时报道商情便利商家经营与周转）”^{[68]P740}但是为了保证集市的正常进行，宣传人员在宣传的时候不能强制把群众集合起来，集委会的干部还经常结合高初中教员，宣传中心工作工商政策，并对政策法规集的管理办法进行广播。

普通集市的宣传方式非常简单，而庙会由于其规模较大，其宣传方式也更为多样化。在龙华的庙会上，除唱旧戏外，还有乡村剧团小学剧团及宣传队化妆宣传作各种宣传工作，在南城司庙会上，还由政府设置了游击区同胞招待所，对游击区同胞一方面慰问，一方面讲解战争形势及边区内部生活。^[94]孟县的泰山庙会“聘请了黄树岩子弟班出演新内容之旧戏，邀请各村剧团；第一中学剧团及大众剧社出演新剧，着重宣传传统累春耕等目前中心工作”。^[95]在北岳一专区“筹委会张贴了各种漫画、标语、传单等宣传品，并由政府贸易局配合在会场上演讲，宣传恢复庙会及建立集市的意义，并作了中心工作统累税的有力宣传，聘请了子弟班上演旧剧，配合新剧、秧歌等文化娱乐，活跃了市场”。^[96]

辛集一般在庙委会中设立宣传股，并组织宣传单专门负责庙会上的宣传任务，如“张贴标语、化装宣传、审查演戏的节目和内容，个别的组织文化棚，陈列漫画照片，组织旧艺人，设立说书棚，印发小宣传品”。在宣传内容方面，有农民翻身做主、地主恶霸、打破中农顾虑、生产模范、保护工商业发展、支前参军战事胜利消息等。并根据这些内容发出简单通俗的说明还有专人负责讲解，如辛集“这样作了取得了群众的好评，据五天不完整的统计，在文化棚听讲与参观的群众有一万七千多人”。“饶阳庙会宣传在文化棚里设有奏乐、相声、双簧，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讲解时事材料，还有冀中话剧社说书，参观的人拥挤不动”。^[56]

由此可见各地庙会的宣传方式要远远丰富于普通集市，也更能吸引广大群众。总的来说，集市、庙会的宣传工作主要是集委会或庙委会来进行组织，他们贴标语，发传单，邀请各学校或乡村剧团进行演出，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既有旧戏，也有新剧。除演戏外还有演讲、说书等各种形式，很好的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无论何种形式，其宣传内容都是相似的，基本上都是党的政策，边区的各种法令法规，对工商业的发展和保护以及战事消息等。这样的宣传使各地群众在赶集的过程中就学习了边区的各项贸易政策，坚定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可以说，集市是边区政府的宣传阵地，边区政府通过各集市使其政策法规深入人心，对边区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4.2 集市上的对敌斗争

4.2.1 集市争夺战

晋察冀边区群众自古以来就有依靠集市进行物资交流的习惯，集市既是物资的集散地又是货币的流通场所，因此集市掌握在谁的手中，就为谁的经济服务。边区集市恢复和建立之后，边区政府依托集市与敌人进行了贸易战、货币战、粮食争夺战等，因此争夺集市成为敌我双方在经济斗争中的一个焦点。

敌伪为了控制更多集市，吸收边区物资采取了各种手段：第一，实行经济封锁，破坏边区出入口的贸易路线。如在广灵地区“敌人对我实行了经济封锁，将平原地带划成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在城周围三里以内，第二道在七里以内，第三道在十里以外。前两道封锁线内的村庄买东西要用购买证，第三道外的村庄则不给购买证实行绝对的封锁”。^[57]第二，大量倾销非必需品。敌伪利用边区税则上的某些空隙漏洞，利用商人走私，大量地向边区倾销非必需品，以套取边区物资。第三，摧毁边区市场。敌伪依附据点，对边

区尤其是游击区的集市进行肆意的破坏。如1943年，正当雁北横涧市场兴起时，敌伪就下令马上摧毁它，仅1941年5月到1942年6月统计，敌伪就对该市场抢掠了13次。^{[96]P276}

第四，破坏边区金融。敌伪利用伪币、法币或假法币对我边区的金融进行破坏，并套取各种物资。

敌伪的各种手段使我边区遭受了巨大损失，集市上出售的走私的非必需品逐渐增多，同时也导致边区外汇储备减少，边区内部大量货物运不出去，而在敌人支配下的集市却渐渐活跃起来，敌我之间的贸易被这些集市所垄断。为了抵制敌人的破坏，边区政府“依靠深入的宣传教育，揭露敌人通过集市掠夺边区物资的阴谋，劝说群众不到敌人据点赶集。有时还派出少量精干的武装人员，袭扰敌占集市，把集市轰散。为防止敌人破坏集市，边缘区的抗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常派出武装人员警戒边区集市。这样即使距离敌人据点相当近的游击区，我们也控制了集市贸易”。^[24]

在游击区的集市上，边区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防止敌人的打击破坏，如将集市分散，化整为零，或者交易时只带少量样品，成交后再进行取货。在北岳第四专区游击区群众“为对付敌特分子的扰乱，缩小目标，1942年组织流动集市、夜市，晚上在树林里隐蔽营业，各行摊贩彼此相距几十丈以至半里，集期不定，有时两天，有时三天”。^{[96]P276}这种有计划的改变集期和地点，并分散经营有利地躲避了敌人的破坏，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抵制商人走私非必需品，边区政府还在境内各集市广泛开展抵制仇货的运动。1. 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一律不用仇货；2. 尽量减少外来必需品的消费；3. 严格执行新税则，严禁非必需品的进入；4. 对贩卖走私非必需品的商贩进行处罚，对守法的商贩进行保护。经过抵制仇货运动，集市上的仇货数量明显减少，土货日渐增多，同时也刺激边区工农业的发展。

除了运用各种办法防止敌人的打击破坏之外，边区政府还主动出击，对敌伪控制的集市进行破坏和摧毁。边区政府结合武装到集日封锁，不让商民赶敌伪控制的集市，反复几次就能将敌人的集市彻底摧毁。边区在摧毁敌人集市之后，在附近建立由边区政府掌握的小集，如在冀中“津武县摧毁了马头，在甄庄建立了一个小集。胜芳摧毁唐二里建立了董家堡。固安摧毁了官村、太子务，建立了大义与大辛庄”。^{[96]P746}这样摧毁敌占区集市与建立我控制之集市相结合，在集市争夺战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边区的经济

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4.2.2 集市上的货币战

集市是货币的流通场所，是边区货币战之依托。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建立之前，边区集市上的货币流通相当混乱，白洋、法币、伪币都能够在集市上进行流通，给集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边区银行建立之后，开始发行边币并投入市场，边区集市上也普遍开始使用边币，抵制伪币。1941年底1942年初，边委会为维护法币，粉碎敌寇略去边区物资的阴谋，发出公告：顷获悉敌伪以掠夺之法币一再贬值，大量向边区行使，一以破坏法币威信，一以掠取我边区物资，企图解除其窘困。本会为维护法币，为保证我物资不被敌寇吸取利用，特重申前令：1. 严禁法币在市面流通。重宣布“只有边币是边区市场上唯一本位币”。2. 所有持有法币人在使用时，必须向边区银行兑成边币，由银行按市价兑给。3. 各政府税收款项，一律停用法币。^[100]边区禁止法币流通之后，就有效地防止了敌伪利用法币或假法币破坏边区金融、扰乱集市、套取物资。

随着集市争夺战的成功，边区集市日益繁荣，而敌伪集市却日渐萧条，赶集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对边币的信心越来越强，而伪币市场则日益缩小，各地群众开始普遍拥护边币，抵制伪币。在孟县敌伪市场极度萧条，市场上货物极少，“持伪钞则买不到东西，各地物价上涨不已”，“敌占区人民生活极度艰难……乡村集市饥民载道”，民众拿着“买不到东西的伪票仰天而叹：准备票，准备票，终究有一天漂（不管用的意思）！在孟县敌占区流行：要白的（白洋），要红的（边币），不要蓝黑的（伪币）”。^[101]在行唐敌占区“商民拒用伪钞，纷纷兑换边币，边币信用更见提高”。^[102]在集市争夺战中，边币市场逐步扩大，而伪币市场则日益缩小，边区和敌占区的群众对边币的信心逐步提高，而伪币却一再贬值，人们纷纷拒用，边币在货币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结 论

集市贸易是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政府建立之后，着力对集市和庙会进行恢复，并在适当的地点建立新的集市，使得边区的集市得到了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边区集市与边区的工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对敌经济斗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边区政府与全体军民的努力下，边区的集市贸易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既繁荣了边区市场，又活跃了境内贸易。集市的发展保障了军需民用，并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经济，支援了抗战，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对乡村集市的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边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为边区军民提供了充裕的物资，调剂了边区的物资余缺，保障了军需民用，发展了边区的经济。

边区内部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边区各个集市负担了边区各地物资调剂的任务，各地剩余物资通过商人尤其是公营商店在边区内部进行流通，并在集市上进行销售，保证了边区的物资供应。正是由于货物流通顺畅，集市上货物充足，边区物价即使在通货膨胀最厉害的时期，边区物价水平也远低于敌占区和国民党占领区。

边区政府对集市的管理使边区集市日益繁荣，各集市从战后消失到逐步恢复，并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各集市的交易量也逐步攀升屡创各地集市交易记录。市场的繁荣还有力地刺激了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和边区经济的发展。边区政府在集市上进行各种土货展览并进行销售，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二、在集市上进行各种经济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集市是贸易战、货币战、粮食争夺战的主要场所，边区以各地集市为依托与敌人开展经济斗争。在与敌争夺市场的斗争中，把掌握和夺取游击区、敌占区市场作为关键。利用市场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将容易遭受敌人打击的集市分散，变大为小，化整为零。组织活动集市、夜市、有组织、有计划的掌握了敌伪集市。对不能掌握和不必要掌握的敌伪市场则实行封锁限制，在游击区建立起对敌反封锁缉私线，有力地封锁了敌伪市场，保护了边区市场及其敌占区、游击区进行的专卖出口贸易。^{[20]P624}

经过激烈的集市争夺战，边区集市以其充足的物资供应和低廉的价格使得边区在对敌市场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集市上的货币战中，边币的信用也日益提高，边币市场逐渐扩大，而伪币信用逐渐丧失，其市场逐渐缩小。总的来说，边区政府在集市上进行的各种经济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经济，尤其是敌占区的集市几乎瘫痪，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三、积累了集市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边区政府在恢复原有集市和建立新的集市之后，十分重视对集市的管理。边区政府对传统集市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造，尤其是对传统牙纪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和教育，大大提高了对集市管理的效率。并在各集市和庙会建立了集市管理委员会和庙会管理委员会，改变了从明清一直到民国，各集市一直被牙纪管理，而没有直接管理机构的历史。边区政府对集市的有效管理，促进了集市的繁荣，有效防止了传统牙纪的营私舞弊，对群众利益进行了保护，并增加了边区政府的收入。这些管理集市的经验的积累对边区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集市的管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晋察冀边区各地集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为边区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有力地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俄]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2] 2004年在南开大学“中国农村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
- [3]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序言[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 [4] [美]施坚雅,史建云等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 [6]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8]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9] 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0]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J].近代史研究,2001,(1).
- [11] 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4).
- [12] 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2).
- [13] 慈鸿飞.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J].中国社会科学,1998,(1).
- [14] 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3).
- [15]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J].近代史研究,2004,(4).
- [16]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
- [17]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4,(4).
- [18] 魏宏运.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J].抗日战争研究,1997,(1).
- [19]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 [20] 苑书义.河北经济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1] 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
- [2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3]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24]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 [25] 倪昌有. 民国十年前后的洗马林工商业[J]. 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226.
- [26] 魏克林, 王中存. 京东重镇林南仓[A]. 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 [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281-282.
- [27] 刘作民, 李顺江. 左家坞买卖街的形成与变迁[A]. 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 [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284-285.
- [28] 邓拓. 晋察冀边区战时建设问题[A]. 魏宏运. 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238-239.
- [29] 经济建设的原则方案[A]. 魏宏运. 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254-256.
- [30] 晋察冀边区各级贸易工作三十年三月至六月贸易工作布置大纲[A].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536-537.
- [31] 燕京杂记. 小方壶舆地丛钞[M]第六帙 10 页上. 上海普易堂印本.
- [32] 边区恢复境内各地庙会的指示[A]. 魏宏运.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422.
- [33] 活跃境内贸易, 泰山庙会即将举行[N]. 晋察冀日报, 1941-5-20.
- [34] “冀中行政公署, 关于恢复和繁荣庙会的指示”.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5-1-168-2.
- [35] 龚关. 官府、牙行与集市——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制度分析[J].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1(1).
- [36] 明嘉靖兰阳县志. 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转引自龚关. 官府、牙行与集市——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制度分析[J].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1(1).
- [37] 民国馆陶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转引自龚关. 官府、牙行与集市——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制度分析[J].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1(1).
- [38] 明嘉靖威县志. 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 转引自龚关. 官府、牙行与集市——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制度分析[J].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1(1).
- [39]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令, 关于各县普遍设立贸易机关的通知[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 [C]. 348.
- [40] 关于贸易管理员目前工作的决定[A]. 魏宏运.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

- [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435-436.
- [41] 加强集市管理[A].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707-708.
- [42]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集市管理委员会组织简章草案[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719-720.
- [43] 重点市场交易所会议初步总结.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5-1-128-12.
- [44]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取消集市交易所统制交易特权的通令[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774.
- [45] 定县庙会宣传的领导问题[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807.
- [46] 赐儿山庙会明天开始[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804.
- [47] 晋察冀边区工商管理三、四、五、六、七月份的中心工作计划[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707.
- [48]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函,为发市场调查大纲供贸易管理参考由.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579-1-65-11;
- [49]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建立经济情报制度的决定[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714-715.
- [50] 北岳一专区贸易局怎样恢复庙会与繁荣市场[N].晋察冀日报.1941-7-10.
- [51] 阜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阜平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 [52] 方圆数十里的市场[N].晋察冀日报.1942-8-26.
- [53] 不赶敌人的集[N].晋察冀日报.1942-2-10.
- [54] 满徐敌抢集市,看见吃的就眼红[N].晋察冀日报.1943-5-15.
- [55] 萧条的完县伪集市[N].晋察冀日报.1942-2-6.
- [56] 冀中行署关于辛集市工商业发展情况.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5-1-244-6.
- [57] 冀东区牲畜税征收办法[A].河北省税务局等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辑下)[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855.
- [58] 冀晋行署斗秤布匹交易手续费暂行办法[A].河北省税务局等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

- 编（第二辑下）[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858.
- [59] 交易费问题[A]. 河北省税务局等编. 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辑下）[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896-897.
- [60] 察哈尔省粮食果品麻交易税暂行办法[A]. 河北省税务局等编. 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辑下）[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861.
- [61] 冀中区斗秤布匹木货交易费征收暂行办法[A]. 河北省税务局等编. 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辑下）[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863.
- [62] 冀中区斗秤布匹木货交易费征收暂行办法[A]. 河北省税务局等编. 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辑下）[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863.
- [63] 对目前集市管理的集点意见[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55.
- [64] 晋察冀地区贸易局集市管理办法草案[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21.
- [65] 安平县工商管理局整理集市的几点经验[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63.
- [66] 晋察冀贸易管理局集市管理办法草案[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21.
- [67] 冀晋行署市场管理问题[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41.
- [68] 冀晋行署关于市场管理问题[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41.
- [69] 整理束鹿拉伯集市的经验[N]. 冀中导报. 1947-6-5.
- [70]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抗战中的中国经济[M].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
- [71] 河北省顺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顺平县志[M]. 1999.
- [72] 河北省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唐县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 [73] 冀中行署工商处关于集市斗争工作汇报[A]. 魏宏运.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744-746.
- [74] 昨天赐儿山庙会盛况空前，赶会市民达七万人[A]. 魏宏运.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

- 商合作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805.
- [75] 晋察冀日报.1944-9-5.
- [76] 长舌头的集.解放日报.1944-3-13.
- [77] 孙文山.粉碎经济封锁,发展边区经济[A].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36.
- [78] 任丘惠伯口整顿集市的经验[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773.
- [79] 晋察冀边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现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节选)[A].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371.
- [8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站(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81] 如此经济战[A].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666.
- [82] 辛集整顿粮店和交易所的经验[A].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773.
- [83] 为今年大生产服务,曲阳县下河庙会红火[N].晋察冀日报.1945-4-4.
- [84] 敌“减低物价”结果保定各集市极为萧条[N].晋察冀日报.1942-11-17.
- [85] 经济封锁的成绩[N].晋察冀日报.1943-4-17.
- [86] 井陘矿区买不到粮食[N].晋察冀日报.1943-5-15.
- [87] 毕福堂.繁峙游击市场[A].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39.
- [88] 平山第一线一个村庄的“合作小集”——一个供销合作社的新创造[N].晋察冀日报.1941年5月11日.
- [89] 晋察冀边区公营公私合营商店组织简章草案[A].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499.
- [90] 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问题讨论总结[A].魏宏运.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429.
- [91] 裕华和华东商店配合征收出卖粮食稳定物价[N].冀中导报.1948年11月23日.
- [92] 莲花滩庙会史话[J].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六辑:268.
- [93]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 [94] 龙华恢复两个庙会，买卖热闹物价便宜[N]. 晋察冀日报. 1942年7月30日.
- [95] 活跃境内贸易，孟县泰山庙会即将举行[N]. 晋察冀日报. 1941年5月20日.
- [96] 北岳一专区贸易局怎样恢复庙会与繁荣市场[N]. 晋察冀日报. 1941年7月10日.
- [97] 经济封锁的成绩[N]. 晋察冀日报. 1943年4月17日.
- [98] 魏宏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
- [99] 冀中行署工商处关于集市斗争的工作汇报[A].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河北省工商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C]. 746.
- [100] 边委会重申前令，严禁法币流通市面[N]. 晋察冀日报. 1942-1-1.
- [101] 不让伪钞烂在手里，敌占区人民纷纷拒用[N]. 晋察冀日报. 1943-4-4.
- [102] 边币信用益高，行唐敌占区人民纷纷兑换[N]. 晋察冀日报. 1943-4-4.

附 录

以下书目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有些书在文中并未引用,在此都一一列出,一来表示感谢,也为其他研究此课题的人做以参考。

档案:

- [1]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出版资料和专著:

- [1] 河北省税务局等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辑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9月第一版;
- [2]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6月第一版;
- [3]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一版;
- [4]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学刊编辑部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
- [5] 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2年6月第一版;
- [6]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抗战中的中国经济,北京:1957年5月北京大学印刷;
- [7]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一版;
- [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4月第一版;
- [9] 文思编,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 [10] 谢忠厚等,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 [11]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3月第二版;
- [12]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北京:三联书店 1979年12月第一版;
- [13] 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3月第一版;
- [14] 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调查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一版;
- [15]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3月第一版；

- [16]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日报社论选 1937-1948，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 [1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第一版；
- [18]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一版；
- [1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三册（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
- [20]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第一版；
- [21]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第一版；
- [22]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 年 5 月第一版；
- [23]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选编——晋察冀部分（上、下）；
- [24] 苑书义等主编，河北经济史（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 [25]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 [26]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 [27]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 [28]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方志资料：

- [1] 河北省顺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顺平县志，1999 年 9 月第一版；
- [2] 雄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雄县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 [3] 高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 [4] 河北省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 [5] 河北省定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定兴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 [6] 曲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曲阳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 [7] 保定工商局编，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 [8] 阜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阜平县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 [9] 民国 11 年, 文安县志;
- [10] 石家庄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石家庄地区集镇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

报刊资料:

- [1] 新华日报;
- [2] 解放日报;
- [3] 抗敌报;
- [4] 晋察冀日报;
- [5] 冀中导报;

参考文献:

- [1] 龚关, 官府、牙行与集市——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制度分析,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1 (1);
- [2] 龚关, 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 近代史研究, 2001 (1);
- [3] 龚关,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 (3);
- [4] 乔志强、龚关, 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3 (4);
- [5] 慈鸿飞, 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1);
- [6] 慈鸿飞, 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2);
- [7] 张利民, 论近代华北商品市场的演变与市场体系的形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6 (1);
- [8] 王庆成, 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 近代史研究, 2004 (4);
- [9] 史建云, 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 近代史研究, 2004 (4);
- [10] 任放,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2004 (4);
- [11] 魏宏运, 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 抗日战争研究, 1997 (1)
- [12] 唐锡林,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 历史教学, 1988 (2);
- [13] 吴英、高振山, 北岳区对敌贸易战, 文史精华, 1995 (7);
- [14] 魏宏运, 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 近代史研究, 1983 (3);
- [15] 谢嘉, 晋察冀边区在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中的政策界限, 经济论坛, 2004 (18)
- [16] 吴占权, 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假币斗争, 党史博采, 1997 (5);
- [17] 傅尚文,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 河北大学学报, 1983 (4);

致 谢

经过数月的奋斗，毕业论文终于即将完成，紧张的神经稍感放松。论文从搜集资料、初稿完成到修改，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我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恩师李金铮教授从论文的开题到论文的修改，都给我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尤其是对我的论文结构的调整，使我的论文条理更加清楚，师母邓红教授也对我的论文修改提出了建议，使论文增色不少。在此，谨对两位恩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恩师除了在学术和论文上对我进行指导之外，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工作作风和大胆创新的进取精神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师恩永在，师道长存，敬祝二位恩师身体安康、合家幸福！

感谢班主任李永强老师！李老师从本科起就是我的班主任，七年的时间，李老师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他的乐观的态度和自信的精神将影响我的一生。

感谢在论文修改过程中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的郑志廷老师、刘敬忠老师、范铁权老师、肖红松老师和彭小舟老师，他们的意见使我的论文得以进一步完善。

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的冯杰老师！冯老师在我研究生的三年中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

感谢同学李领波、吴建征、李杨杨、崔玉敏、宋渠江以及所有 2006 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所有同学，在这个团结的集体中，我度过了三年最美好的时光。

感谢未婚妻马艳辉！感谢她陪伴我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感谢我生活了七年的母校——河北大学！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父母永远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